

学生应知文史知识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

张俊杰  
编著

## 目 录

中国城市的起源 .....	1
中国城市起源的时代 .....	1
“城市”名称的来源 .....	4
中国城市的城址选择 .....	5
城址选择的原则 .....	5
城址的转移 .....	12
中国城市的城墙 .....	29
城墙的起源 .....	29
奴隶制时代的城墙 .....	31
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墙与城市 .....	35
秦汉时代的城墙与城市 .....	37
秦汉以后的城墙与城市 .....	41
城墙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	45
中国城市的类型 .....	53
政治城市 .....	54
经济城市 .....	60
军事城市 .....	72
文化城市 .....	75
中国城市的形状 .....	78
中国城市的规划 .....	102
中国城市的园林 .....	119
中国著名都城的园林 .....	121
中国著名地方城市的园林 .....	162

## 中国城市的起源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城市。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城市出现的时代也就有了差异。

### 中国城市起源的时代

关于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仍是目前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后期的龙山文化，就是中国城市出现的具体时代，因为考古上已经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古城，城也就是中国城市的雏形，或早期的城市。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城市出现于原始社会的三次大分工之后，城市是由市直接发展而形成的，市是城市的前身。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最早筑的城，实际上是有围墙的村落，具有真正规模的城市出现于春秋后期，战国时才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其实，中国古代的城和市都兴起比较早，原始社会后期都已经出现。《黄帝内传》、《世本》、《淮南子》、《吴越春秋》等古籍，都记载黄帝“筑城”或“鯀作城郭”。而且还特别说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显然是防御工程。这种防御工程并不是城市，和城市没有任何联系。早在原始社会后期，不仅文献记载“黄帝筑城邑”，“夏鯀筑城”，而且已得到考古上的证实。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的筑城起源于原始社会中后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代，分别在山

东、河南和湖南发现了这样的古城。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了完整的古城，距今已有四千年之久。该城面积仅 0.17 平方千米。1994 年，又在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屈家岭文化中期古城遗址，距今已有 4800 年之久，出土文物极其丰富。这座古城遗址的发现，不仅为长江流域人类文明史增添了光彩，而且把中国古城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一千年。接着，又在河南省郑州市北发现了距今 5300 年前的古城，把中国古城的历史推向了近 6000 年左右。尽管中国古城出现的很早，但仍然是防御工程，不具备城市的基本形态。城，就是用夯土筑成的高大墙体，展成一线称长城，围成一圈就是城。

《墨子·七患》说：“城者，所以自守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城是以防守为基本功能。城市则不然，它必须有集中的居民和固定的市场，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为城市。根据中国历史的特殊情况，当在城中或城的附近设市，把城和市连为体的时候，就产生了中国早期的城市。

市是货物交换的地方，开始时物物交换，货币产生后就成为买卖的场所，即市场，和城没有任何关系，更不能说是城市。《易·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卦名，设法以合物也）。”

《世本·作篇》，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这就说明，市与城也没有关系，只是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与今天的农贸市场或农村集市很相近。这种市不具备城市的基本形态，也并不都是中国城市的前身。因此，把中国城市的时代认定在原始社会的后期是不对的，当

时虽然有城、有市，但并没有什么关系，前者为了“盛民”，后者为了“买卖”，毫不相干。这样的“城”和“市”早就存在，但各有自己的功能，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连系，只能看作原始社会的“城”和“市”，不能称之为城市。

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应该是西周，因为夏商的都城是否设市，既无文献上的依据，也没有考古上的证明，只有西周的都城丰镐设市，有《周礼·考工记》为证。在中国，只有到了城内或城的附近设市的时候才出现了城市。因为人口众多和有市场是城市的基本标志，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之为城市。仅有市而无集中的居民，或者仅有集中的居民而无市，仍然只能是单个的城或市，都不是特定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并不一定有城，但必须有市，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城和市的结合体，往往先筑城而后设市，城的地位和作用比市更为重要，这是中国特殊的历史、自然环境所形成的中国城市的独有特点，不能以一般城市形成的规律来解释。西周的首都设市，一般诸侯国的都城也应该设市。

《周礼》就有司市，市的设立和管理已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一部分。市场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市有市门，定时交易，“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证明市区狭小，必须分次聚合才能满足交易的需要。当然，设在中小城市的市，入市交易的人数有限，未必都如《司市》所言，分次聚合。西周时已形成早期的城市，但城市的称呼却出现很晚。日本人认为“‘城市’一词的语源，出自中国。当时有商贾‘集中之地’、‘市’、‘都’

的意思”。

## “城市”名称的来源

中国城市出现于西周，但在西周的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城市”一词。不难看出，城市兴起在前，概念形成在后，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出现城市的概念势在必行。《诗·邶风·定之方中》首先记载了春秋时卫“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的事，这应该是春秋时代最早出现的“城市”一词。不过，根据孔颖达的疏文，不应“城市”连读。他说：“文公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处，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始筑城立市，故连言之。”尽管筑城立市符合中国早期城市兴起的特点，但仍为单个的“城”和“市”，还不是我们所说的有关城市的特定概念。

关于中国城市的概念，出现于战国。开始称“置社有市之邑”，也就是指城市。《战国策·齐策五》，苏秦在游说齐缙王时说：“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战国策》和《资治通鉴》中都有“城市邑”的称谓，也同样指城市。《战国策·赵策一》，赵曾割“城市邑五十七，命以为齐，而以求安平君而将之。”《资治通鉴·周赧王五十三年》，韩国为了阻挡秦国，愿献城于赵，“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献之大王”，促使秦、赵交战。胡三省说：“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只有大邑才具备城市的资格。《韩非子·爱臣》才明确提出了城市的概念，他说：“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

城市一词终于成为反映特殊地理实体的准确概念，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见，直到战国后期，才有了城市的概念。当然，城市产生在概念之前，前到什么时代，笔者认为就是西周。西周的城市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市还有一间之隔，由于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程度和人口多少不同，城市的形态也就有了差异。概括地说，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在城内设市以后产生的。后来，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一些交叉路口、水路码头、军事要塞，或人口集中的地方也形成了城市。这些城市并不一定筑城，但它们都是真正的城市。因为这些地方既有众多定居的人口，又有市场，符合早期城市的基本条件。

## 中国城市的城址选择

城址是指城市的具体位置和活动的空间。在建城以前，都要进行精心的选择，然后才划定区域，规划设计，修筑高大的城墙，圈定为城市的具体位置。被城墙所圈定的范围，就是中国早期城市的城址。

## 城址选择的原则

平原广阔平原是中国城市的摇篮。平原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形平坦，交通方便，水源丰富，物产丰盈，能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仅土地资源一条就使城市有足以回旋的余地。物产丰盈更使城市的发展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早期的城市无不在平原之上，《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货

殖传》中以“都会”相称的城市，共有 13 处，即长安、洛阳、邯郸、燕（今北京）、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吴（今苏州）、寿春（今寿县）、番禺（今广州）、宛（今南阳）、江陵（今湖北江陵）、合肥、睢阳（今河南商丘）、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就是典型例证。不难看出，中国早期城市是平原孕育起来的灿烂明珠，犹如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闪闪发光。中国的大平原都在东经 110° 线以东，只有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例外。实际上，关中平原在自然区划上属于华北区的范围。这样说来，上述 13 个城市没有一个不在中国著名的平原之上。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央，洛阳、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宛、寿春、合肥都在华北大平原上；江陵、吴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只有番禺位于华南沿海平原。东北平原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平原，由于经济开发较晚，中国早期的城市没有一个首先在这里兴起。正如范蠡对越王勾践所说：“今大王欲立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证明平原自然环境优越，为中国城市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最早的三大农业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黄河下游平原，也是中国城市最早兴起的地区，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水陆交通便利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址选择必须考虑水陆交通条件，即交通方便。城市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涉及到一个广大的面，交通方便就必然成为城市兴起、发展的支柱和杠杆。中国早期的城市无一例外，都选址于水陆交通方便的地区。正如桑弘羊所说：“燕之涿（今河北涿州）、蓟（今北京），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魏之温（今河南温县西南）、

轶（今河南济源东南），韩之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齐之临淄，楚之宛（今河南南阳）、陈（今河南淮阳），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县），三川之二周（今河南洛阳东），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都之中，跨街衢之路也。”这段话极其精确、科学地解释了中国早期城市选址与交通道路的关系。

中国早期的城市大都是政治统治的中心，选择城址也必须以交通方便为原则。春秋战国各国的国都，以及秦汉王朝的首都，如咸阳、长安、临淄、郢、新田、大梁、邯郸、阳翟、蓟等城市，无一不在交通要道之上。这些城市，像咸阳、长安是全国统治的中心，那么，全国的交通网也就由此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秦代通往全国各地的十条干线，就是以咸阳为中心伸展开去。实际上，秦选择咸阳作为都城时，就是因为咸阳是控制关中西东大道的咽喉。关中地区的东西大道必须从咸阳渡过渭河，“咸阳古渡几千年”就是明证。属于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在选择城址时也是以它的交通地位为出发点。譬如，齐国占有今山东广大地区，临淄虽然偏处淄河西岸，但却是古代东西大道的必经之地。由临淄向东，可直达山东半岛的成山角；向西，可与邯郸、洛阳相通；向南，可与彭城相连；向北，可直达渤海湾，由此出海。临淄实际上是山东地区交通的中心。

城市是商业中心，只有把城址选择在交通方便的地区，才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形成经济都会。上述著名经济都会长安、洛阳、邯郸、蓟、临淄、宛等城市，都位于陆路交通干线之上；陶、睢阳、江陵、吴、寿春、合肥、番禺等城市，都位于水路交通干线之上。春秋战国、秦汉以后的城市，其城址

选择也都与交通便利有密切关系。

城址选择在交通方便的地区，也有利于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西汉长安城就是全国文化的中心，不仅有全国最多的藏书，而且有全国最高的学府——太学。太学规模宏大，其遗址就在今西安西郊高压开关厂附近，汉长安城南安门之外。西汉末年，太学弟子增至三千人。这些人由地方考察，随上计吏进京，其进京路线，恰好就是以长安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出去的水陆交通网。齐国临淄的稷下之学也有类似情况。

城市不仅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必须有广阔的腹地，才能够提供充足的生活必需品。中国早期的城市均选址于水陆交通干线上，就是为了就近解决供养问题。也就是说，城市需要农村供养，而提供供养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水陆交通方便。上述著名经济都会无一例外位于水陆交通干线之上，就是明显的例证。

地形有利，水源丰富地形指城市周围的地形和城市内的微地形。就周围地形而言，城址必须选择在地形险要的地区之中，能够充分防御，以利于城市的安全。因为中国早期城市多因政治中心而兴起，城址选择对能否防御尤为重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主要建都关中平原，就是因为关中平原三面环山、东临黄河，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一座宏伟的城市从关中平原的中央拔地而起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其他城市的城址选择，不是傍山、倚原、临河，就是处于两山之间或河谷之中，或者面临大湖、大海，以广阔的水域为凭借，使城市处于安全地位。微地形往往是城市选址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把城址选择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之中，使城市处于有利地位，即即使城市有足以回旋的余地，又能

高低错落，宏伟壮观，同时引水也很方便。隋唐长安城选择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的“六坡”地形作为城址，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六条东西向的高坡并不是什么优点，但经宇文恺精心规划设计以后，却使长安城大放异彩，增大了长安城的立体空间，居然使长安城的平面布局立体化，收到了奇异的效果，气势磅礴，绝无仅有。唐以前的扬州城也倚蜀冈（位于今扬州西北）而立，南临长江，既水路交通便利，又地形高亢，据险而守，雄峙于长江岸上，是重要的经济都会和军事重镇。苏州城址从选定之日起，再未变动过，就是同城址所在地的微地形有利密切相关。苏州位于太湖平原上，水网密集，城址依运河而立，三横四直的运河线就成为苏州城址的基本骨架，前临街、后临河就成为苏州城的基本特点，城址自然再无法转移。

城址虽然受微地形的制约，但必须引水方便。扬州城高居蜀冈之上，前临大江，当长江南移后，商业罗城即转移到蜀冈之下，除平原广阔外，显然同引水方便有密切关系。隋唐长安城虽然有“六坡”地形作为骨架，但冈与冈之间的低地却是开渠引水的理想所在。尤其是低洼地带，更是开辟湖泊的良好湖址，像曲江池、大明宫太液池、兴庆宫龙池等都是例证。苏州城选址于水网中心，引水方便，自不待言。其实，每座城市在选址时，都要考虑到地形有利和引水方便这一基本原则。否则，就是选址不当，影响城市的发展，甚至于严重制约城市的发展，使城市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只好废弃，另选城址。

地形高低适中《管子·乘马》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

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也就是说，城址选择要注意地形高低得宜，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否则，不是引水不便，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地形高低得宜，既可省去修筑沟防，又能引水方便，解决城市供水问题。

《管子》虽然只就选择都城而言，实际上适用于所有城址的选择。这样的城址，对城市布局也极为有利，台地可选作住宅，低地可作为市场、工厂、仓库区。大山之下的洪积扇，既有广阔的平原，又是水源最丰富的所在。北京的选址就是一个典型。北京城址就位于永定河的山前冲积扇上，平原开阔，水源丰富。因为山前洪积扇恰好是高低地形的结合部，为潜水溢出带，水源最为丰富。大川之上，也就是指河流的二级阶地，一般距河岸 20 米左右，既高而平坦，不易遭受洪水的袭击，又距河岸较近，引水方便，原始社会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址，都毫无例外地位于河流的二级阶地之上，证明在人类文明开始时，选择居住地就离不开河流的二级阶地。后来的城址选择，虽不尽然，但河流的二级阶地仍是选择城址的理想所在。西汉长安城就位于渭河的二级阶地之上，发展成为全国最著名的都城之一。

地形高低得宜，应该是自古以来选择城址的基本原则。因为它具有地形高而平坦，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城市用地问题，使城市不断得到发展。同时，水源丰富，能充分解决城市供水问题，为城市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气候温和，物产丰盈气候条件是人类生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人们都愿意生活在气候条件优越的地区，即气候温和，冷热得宜，雨量充足，干湿适中。城址选择更应该如此，因为城市是人口集中的所在，更需要优越的气候条件。根据对全世界 20 万人以上城市的统计，

热带城市占总城市的 7.6%；干燥带占 5%；温带占 72.6%；冷带占 14.8%；寒带 0%。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城市分布在温带上，证明温带气候冷热得宜，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可见气候条件也是影响城址选择的重要原则。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只要具备选择城址的基本条件，当地又有人类生存，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必然会出现城市。

物产丰盈指农、林、牧、副、渔、矿、水等各种物质资源，它们既能为城市的兴起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又能因分布地区不同，影响城址的选择。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占有城市的绝大多数，它们都分布在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中，而且往往处于中心地位，成为农产品集散的中心。这类城市，其城址必然选择在农业地区的中心，既能使城市最大限度地得到供养，又能使农产品迅速集散。矿业城市的选址必然距离矿产资源很近，因为它是指挥机关的所在地，又是矿工的居住地和满足矿工生产生活的供养地，不能距离矿区太远。海港城市的选址，必然离不开优良的港口，因为这是海港城市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优良的港湾为港口城市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但并不是所有的港湾都能形成港口城市。这主要取决于广阔的腹地、丰富的物产和海路交通路线。当然，优良的港湾是港口城市选址的基本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其他各类城市而言，城址的选择也必须具备物产丰盈这个基本条件，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就会昙花一现，或始终处于落后的地位。

## 城址的转移

城址选择得当与否，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也就是说，选址得当，有利于城市的发展，相反，就限制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性质不同，选址的要求也就有了差异。譬如，以防御为目的的城市，城址就必须选择在地理形势险要的地区；以航运为主的城镇，城址必须选择在江河沿岸或港口码头地区；以采矿为主的城镇，城址必须靠近矿区；以工商业为主的城镇，城址必须选择在交通要道之上；以旅游为主的城镇，城址必须选择在风景区的近旁，或具有多种名胜风景功能的地区等等。当然，一个城市具有多种职能，城址选择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尽管城址的条件千差万别，但城址选择得当与否，都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即规模大小、发展快慢、环境质量优劣等。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最初选择的城址未必都是恰当的，因此，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城址转移。在中国历史上像苏州、成都这样城址从未转移的城市，数量并不很多，而大多数城市都有过城址转移。其原因是最初选址不当，或为了争取更有利的地理条件，使城市得到更大的发展。

由于选址不当而使城市终于废弃的也为数不少。这类城市有些因水源难于解决而废弃，有些因受沙漠威胁而废弃，有些则被河流圯毁或被湖泊所湮没，终于成为废墟。西汉的美阳县位于今陕西扶风法门镇，东临美阳河。由于河流下切，地下水位下降，用水困难而废弃。实际上美阳县城选址于今法门镇，当初选址就不大妥当，恰好位于山前水流溢出带的空白地带，地下水位深，打

井本来就很困难。位于今陕西靖边县北的白城子，是十六国时期夏国的都城统万城的遗址，后来曾是唐宋夏州城的所在地。夏国当初建都于此，证明当地水草丰茂，具有建都的有利条件。然而，这里地下沙源丰富，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势必风沙漫延，成为风沙区。到了宋代，终因夏州深处沙漠之中，随时都有被沙漠埋没的危险，才不得不下令放弃。位于山西万荣县的宝鼎镇，也就是唐代的宝鼎县和北宋荣河县的所在地。1923年，荣河县迁至宝鼎镇以东的荣河镇，就是因原来的县城不断遭到黄河的圯毁，才不得不迁移。今宝鼎镇已被黄河圯毁一半以上。荣河县在建国后与万泉县合并，称为万荣县，县治东移解店，而新的县城又受到沟头的威胁。唐代的泗州城位于今安徽盱眙县北，为漕运咽喉，汴河与淮河在此相汇，商业十分兴盛。明清两代不断加高高家堰，以抬高洪泽湖的水位，使洪泽湖迅速膨胀，淮、湖也合为一家，不分彼此了。位于淮河岸上的泗州城，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终于被汹涌的洪泽湖所吞没，沦入湖底。近年来，每当淮河流域天旱少雨时，洪泽湖水位下降，泗州城垛仍可露出水面。位于黄土高原上的许多州县城，都因水土流失严重被沟冲毁而废弃。位于今陕西洛川县东北的旧县，也就是原来的洛川县城，已被沟头所冲毁。十六国时期匈奴族刘渊所建都的左国城，位于今山西方山县峪口乡北川河东，城址已被12条大沟所分割。位于甘肃庆阳西峰市东北的唐彭原县城，已三面临沟，并有一条大沟冲进城内，长达五六十米。陕西神木县北的杨家城，即唐宋麟州城，为一座军事重镇。该城址位于窟野河东岸，河岸陡峻，沟头已严重威胁它的存在。诸如此类的例证不胜枚举，比比皆是。上述被废

弃的城市，不管何种原因，都和当初选址不当、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有密切关系。

当然，许多城址的转移，则是为了争取更为有利的地理条件，使城市继续向前发展，人为地放弃旧城，另选新址。西安城址曾有四次转移，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西周的丰镐城是西安地区最早的城址，位于沔河两岸。丰京位于沔河西岸，镐京位于沔河东岸，相距甚近。

丰京位于沔河西岸，由于年代久远，对于它的具体位置，历来都有争论。根据考古发掘，在今沔河西岸的客省庄、马王村、曹家寨、张海坡、大原村、冯村、东西石榴村等，东西长5千米，南北宽2.5千米的范围内，西周遗物特别丰富，除铜器、陶器以外，还在沔西乡所在地发现了多处西周车马坑。既然当地有丰富的西周遗物出土，又有许多车马坑，丰京应该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从丰京所在地区的地理形势来看，这里恰好位于沔河的二级阶地之上，符合古代选择城址“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原则。根据实际踏勘，沔河西岸的地势略高于东岸，而且水源丰富，东有沔河，西有灵沼河，还有灵沼等湖泊，使丰京可以得到充足的水源。

周文王迁都丰京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继位，又把国都从丰迁到了镐。镐京位于沔河东岸，史称宗周。武王迁都的原因，是由当时政治发展的形势和地理上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就地理条件而论，丰京范围较小，又受到沔河、灵沼河的限制，无法进行扩建，只有向沔河东岸发展，才是它的唯一出路。因为沔河以东地势更为开阔，并有高阳原（今斗门镇东北）可以选作城址，既使都城有回旋的余地，又接近漓池和漓水，使

城市供水更为方便。镐京就是因瀉池、瀉水而得名的，其城址选择当然与二者有密切关系。根据考古发掘，今沔河东岸的斗门镇、花园村、普渡村、洛水村、上泉北村、白家庄等，东西长 1.5 千米，南北宽 4 千米的范围内，分布着许多西周遗物和墓葬，镐京遗址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在斗门镇的西周遗址中发现了板瓦，完全证明与都城的建设有关。由于汉武帝时开凿昆明池，破坏了镐京遗址，致使镐京遗址的大部分沦入池底，已难于找到它的踪迹了。在开凿昆明池时所发现的人类活动的遗物和灰烬，正是镐京遗址的铁证。

西周末年，由于犬戎入侵，周平王迁都洛邑，丰镐终于被废弃。

秦国有九次迁都，最后定都咸阳。秦孝公十二年（前 350 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秦由栎阳（今临潼东北武屯一带）迁都咸阳，有利于秦国东出函谷关与六国争锋。咸阳位于渭河中下游分界处，是控制关中地区东西大道的咽喉，自古以来，凡东来西往的人都必须从这里渡渭，“咸阳古渡”被誉为关中八景之一。东西大道是关中地区交通的主干道。由于咸阳以东的渭河北岸有泾河、石川河、洛河等大川，横渡上述河流并非易事，故东出的道路就必须从咸阳渡渭，沿渭河南侧出函谷关；与此相反，咸阳以西的渭河南岸有涝河、黑河等大川，而渭北的咸阳原东西二三百里却没有一条河流，地形平坦，从咸阳西行，当然以走咸阳原最为理想。同时，咸阳附近的渭河河势顺畅，两岸土质坚硬，有“十里长峡”之称，河道很少摆动，容易建立渡口或修建桥梁。秦国选择咸阳建都，主要是为了发挥水陆交通上的优势，使咸阳成为居中指挥的司令部。